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学术研究系列丛书

中国广播电视新论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S RADIO AND TELEVISION



张振华 主编

中国广播电视新论

主 编 张振华

副主编 张 聪 赵德全
王 锋 陈富清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广播电视新论/张振华主编.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4.8

ISBN 7-5043-4312-9

I. 中… II. 张… III. ①广播工作—理论研究—中国②电视工作—理论研究—中国 IV. G2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78954 号

中国广播电视新论

主 编:	张振华
责任编辑:	任逸超
封面设计:	马 申
责任校对:	谭 霞
监 印:	赵 宁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86093580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 (邮政编码 10004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保定地质勘察设计院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500 (千) 字
印 张:	23.5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
书 号:	ISBN 7-5043-4312-9/G·1693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学术研究
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李 丹

副主任：刘习良 张振华

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为公	王 甫	刘习良	李 丹
李 宏	杜百川	陈富清	张子扬
张小平	张振华	张 聪	赵丽平
赵德全	陶世明	黄 勇	温 飙

出版说明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自 1986 年成立以来，始终恪守学术团体的性质，贯彻“开展广播电视学术理论研究”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的建设和发展”的办会宗旨。除尽力办好广播电视理论刊物——《中国广播电视学术刊》，组织开展群众性学术研讨活动外，学会本部许多同志还拿起笔，撰写或编辑出版了不少学术性著作，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探索创建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理论体系，默默地进行着奠基性工作。

这些成果，有些是集体编撰，有些是个人著述，从不同的侧面印证着中广学会成立 18 年来在学术研究方面做出的努力，既是学会的学术资源，更是学会的精神财富。

只可惜的是，当初由于缺少长远的统一规划，早先的研究成果一直呈现分散状态，未能形成系统。不要说局外人士，就连学会内部的工作人员，也难以见其全貌。

为改变这一状况，中广学会决定从今年起，将学会本部范围内带有学术性质的著述一律纳入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编辑的《中国广播电视学术研究系列丛书》。我们希冀若干年后，这套丛书将初具规模。这不惟是对学会学术成长史的一种记

录，更是对中国广播电视学建设的一个方面的贡献。

在本书的最后，附录有收集到的自学会成立以来出版的各种学术著作篇目，权作是对以往著述成果的一个简单总结。

《中国广播电视学术研究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4年7月

理论创新的尝试（代序）

刘习良

1997年4月，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召开会议，进行换届选举，成立了第三届理事会。我就是从那时候起开始加盟学会，担任常务副会长的。今年4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领导正式宣布由李丹同志接替我，任常务副会长。屈指算来，我以常务副会长职务在中广学会工作了整整七年。学会章程规定，广播电视学术研究是学会的中心任务。我一直把这条规定视为金科玉律，不敢稍有偏离。执行规定不能光靠良好的愿望，还要有具体行动。中广学会第二届理事会期间，曾经编写了《中国广播电视学》，于1990年9月出版。这部著作是我国前辈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为推动广播电视学术研究作出的重要贡献，为我们这一代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我到学会工作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提出了在第三届理事会期间编写两本学术著作的建议，得到了同事们的赞成。一本是《中国电视史》，另一本就是读者看到的这本《中国广播电视新论》，简称为“一史一论”。不过，由于编写的难度确实比较大，再加上学会还有诸多事情，“一史一

论”的编写任务未能如期完成，顺延到第四届理事会期间。

关于如何编写“一论”，学会内部曾经讨论多次。一开始，曾经想组织力量修订《中国广播电视学》。自《中国广播电视学》出版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在这段时间里，广播电视业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和日新月异的变化。目前，仍然处在重大变动的过程之中。任何事物处在变动时期，总要向理论发出呼唤，呼唤科学论证，呼唤理论创新。据此，原来的认识、原来的概括、原来的阐释、原来的论述，已经部分地落后于实践的嬗变。修改势在必行。修改《中国广播电视学》，首选是请原作者参与，至少要和原作者反复商量。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有的作者已然仙逝；健在者当中有的年事已高，再要他们亲自动笔，实在说不过去。再又一说，修改一本书也不是多么容易的事。倒不如保留原书面貌，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于是，最后决定“另起炉灶”，编写一部“新论”。

为编写“新论”，大家共同议定了几条原则。首先，这是一部“以论为主”的理论著作，记述广播电视业发展变化的情况不是本书的主旨，只是为论点提供论据。其次，这是一部“突出新论”的专著，而不是从“开天辟地”说起，一般知识、人所共知的事实，均可简单提及甚至可以省略，重点在于体现广播电视研究的最新成果，既包括参与本书写作的作者们的独到见解，也包括他人的精辟论述。第三，由中广学会直接组织编写，主持审稿、定稿工作，不采取招标或者委托的办法。

敲定编写办法后，中广学会学术部先后聘请了十几位学有所成的作者，有大专院校的教师，也有学会本部成员，以及广播电视第一线的工作人员，都是近年来在广播电视理论

研究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专家、学者或是年纪较轻的学术界新秀。多年来，他们以文化批判眼光关注、审视广播电视业的发展变化，见微知著，提出过许多发人深思的见解。

本书主编张振华同志是中广学会副会长。在他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时，由于日常工作繁忙，不可能拿出更多时间参与学会工作。2000年7月，振华同志退出原来岗位。8月，即开始把主要精力投入学会工作，担任专家组组长。振华同志来学会后，我立即想到由他来担任这本理论专著的主编比我更加合适。原因是他专修的是新闻专业；从事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知识结构显然比我这个学习外语专业的合理得多。对我的建议，他慨然应允。我以为，必须说明一点，就是振华同志绝不是挂名主编。为了保质保量地完成编写任务，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他先后通读了两遍本书原稿，根据中央和总局陆续公布的新政策、新文件，以及广播电视业改革的新进展，提出许多修改意见，直至直接动手修改。按照他的意见，在原稿基础上增加了不可缺少的一章（广播电视法制论），重新编写了一章（广播电视产业论）。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忌在重复；贵在言之有物，忌在空话连篇；贵在实事求是，忌在脱离实际；贵在谦虚谨慎，忌在无知妄言。这个道理，所有理论工作者都懂得。然而，说起理论创新，谈何容易！尤其是广播电视业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质；相对于一些发达国家，我国的广播电视业发展要晚一些；更由于社会制度不同，不可能也不应该照搬别国经验。编写本书，必须具备独创精神，难处也正在于此。

谈到广播电视理论创新，我个人以为绝不是随心所欲地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也不是事事“从头开始”，而是要扎根于现实土壤，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努力方向大体包括

四个方面，即探索未知领域、修正原有结论、提高研究层次、加强研究深度。

参加本书编写的作者作出了艰苦的努力。至于是否达到了预想目标，还要请有兴趣阅读本书的读者给予适当评价。理论创新是个动态过程。今后，我们还会密切跟踪广播电视业实践的发展变化，响应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与时俱进”的号召，不断探索理论创新的途径。正如伟大的诗人屈原所说：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2004年6月13日夜

于知还室

绪 论

第一节 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背景

本书的题目为《中国广播电视新论》。尽可能地出“新”是本书的宗旨。理论创新是时代发展对理论工作者提出的艰巨而繁重的任务，也是理论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表现形式。理论的发展和连绵不断的旺盛生命力最主要的表现体征，就是她的与时俱进的创新性。常青的实践之树呼唤着理论创新之泉的滋润，而实践的发展必定为理论创新提供一种反哺。在新旧体制相互转换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理论工作者应该以科学的精神和敏锐的直觉紧跟或超前于实践前进的步伐，履行好实践“守望者”或“批判者”的职责，“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普利策语）。至少他不能被社会实践抛下太远。

我们已经亲身感受到了中国社会目前发生的重大变化。归纳起来，推动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主要有四种力量。一是经济力量的推动。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社会经济生活变得异常活跃，各种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在市场“这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开放的市场、滚动的资本及包括跨国商业在内的诸种经济要素，形成一股巨大的推动力量，动摇着中国社会长时期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超稳定结构；二是行政的力量。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组织越来越回归到服务于社会生活的本位上

来，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法制规章的落实和宏观调控行为的规范，政府的行政行为越来越受制于社会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框架的约束，由过去的“无限权力政府”向“有限权力政府”转变，“服务社会”成为政府行政行为的应有之意，并从其所制定的各项政策及行政规章中体现出来；三是信息的力量。随着社会信息化平台的建立，特别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化浪潮的涌起，将极大地促进社会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浓缩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全球化”与“一体化”的实现将成为可能。过去所形成的诸多人为的壁垒在社会信息革命中化为泡影。信息的公开与透明，“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的现实，必将冲破信息垄断的传统格局，从而促进社会均衡多元发展格局的形成；四是高科技的力量。在现代社会，高新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催长因素。特别是在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过程中，高新科技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变化往往是革命性的，将大大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先进技术已融入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真正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要素。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广播电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节目质量不断提高，事业规模迅速扩大，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同时，人们对广播电视的认识也不断发展。比如，对广播电视性质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过去，广播电视的性质是单一的，仅仅认为她是党和政府的工具和喉舌，广播电视的一切活动都围绕着这个性质展开。随着实践的深入发展，广播电视的性质也丰富发展了，具有了多重属性，她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喉舌；既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具有非常鲜明的产业属性，从大的社会分工看，广播电视属于第三产业；从行业划分，广播电视又属于

大范畴的社会文化产业。从社会功能上看，广播电视的功能大大的拓展了，由过去的单一功能发展成今天的多层次功能。长期以来，人们把广播电视仅仅看作是新闻传媒，她的主要功能就是传播新闻，引导舆论。后来，人们认识到，广播电视更是大众传媒，她的服务性和娱乐性功能也非常突出。现在，随着广播电视功能的进一步开发，以及数字、网络技术的发展，广播电视又担负着某种社会信息产业的功能。而广播电视的产业功能和信息功能决定了她必然具有一定的经济运营功能，也就是说，广播电视的许多活动可以通过市场营销的方式来实现。由此可见，今天的广播电视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时期的广播不完全一样，和改革开放之前的广播电视也有很大的区别。实际上，对广播电视的认识也是一种与时俱进的过程。

进入 21 世纪，我国广播电视在经历了上个世纪后 20 年的改革发展取得巨大变化之后，又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转折时期，广播电视所面临的生存环境更为复杂。主要有这样几方面：

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完善，广播电视赖以存在的社会体制建构和国际环境都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社会格局及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都将加快。特别是我国加入 WTO 后，那些不适应国际贸易规则和与市场经济体制相背离的法律、法规都将逐渐被废止，对各种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包括国有的、民营的、个体的，也包括外资企业，都将一视同仁，实行国民待遇。在这样的背景下，计划经济时期形成并熟练运用的一些指导广播电视工作的思路和方法，就难以适应新时期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要求，我们必须尽快熟知和掌握市场经济条件下广

播电视的运行规律和经营方式。

2.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整个社会的文化消费需求呈急剧增长态势, 特别是大众化、通俗化、娱乐化, “快餐化”的文化消费样式迎合了市场的需要。同时, 整个社会的艺术鉴赏能力和审美能力普遍增强, 文化消费渠道越来越多样化, 精神文化消费的个性化色彩越来越浓, 使传媒领域的市场细分化趋势日益明显, 各种媒体普遍加强了“角色”定位, 通过专业化分工积极争夺受众。在传统媒体激烈竞争的同时, 因计算机网络技术所引发的“新媒体”的崛起, 以及国外传媒巨人、音像文化产品大兵压境, 使我国广播电视面临着内挤外压的严峻形势和巨大的挑战。广播电视将高扬一种什么样的广电文化, 来充分展现我们民族化和本土化的东西, 从而积极主动地应对和参与来势凶猛的全球化和国际化呢? 这必然成为我们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3. 我国广播电视地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现象, 诸如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的发展不平衡、广播电视事业和产业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广播与电视两个媒体之间的发展不平衡, 广播电视的产业功能没能得到很好的开发, 广播电视宣传的宏观管理力度不够, 自律意识有待加强, 社会公信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4. 以数字压缩技术和卫星通讯技术为标志的高新科技发展运用给广播电视的现有格局带来革命性变革, 使广播电视的行业规模、发展水平、运行机制、思想观念以及传输方式、覆盖方式发生深刻变化, 进而改变传统广播电视业的组织活动方式和管理体制。

5. 广播电视的生产方式需要变革, 广播电视的资源配置需要优化和整合。也就是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广播电视产品的生产，既要遵循精神产品的生产规律，也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特别要适应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要求，破除小农生产方式的束缚。精神产品也有占领大市场的问题，作为有责任感的广播电视工作者，这也是一种体现政治意识的手段。就整合广播电视资源来看，包括整合信息资源、节目资源、传输技术资源、覆盖资源、人才资源等。所谓优化资源，实际上是对广播电视生产关系的一种调整，包括对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的调整，对生产方式、组织结构的调整，对人员结构和内部运营机制的调整，既包括资产重组、体制创新问题，也包括对外联合、兼并等问题。

所有这些广播电视实践的发展为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土壤，必定生发出新的理念、观点、概念、范畴；而广播电视理论的创新，既是一种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一种理论自然成长的必然过程。

第二节 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

面临国内、国际新形势的挑战，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十六大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精神，保证广播电视业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首先，邓小平理论是深化广播电视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和重要的理论保证。党的十五大确立的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用邓小平理论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是我们党总结近

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研究中国现阶段的广播电视实践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就应该深刻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在完整把握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广播电视发展实际，对广播电视的宏观和微观问题进行深入的钻研和探讨，从而建立起科学、系统、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体系。这样，我们才能主动把握广播电视发展的运行规律，才能高屋建瓴、胸有成竹、把握主动，卓有成效地做好广播电视工作。

从总体上看，邓小平理论指导新时期广播电视的改革发展应从三个方面理解和把握。

第一，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和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邓小平一贯坚持的哲学立场和思想方法。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探索新时期广播电视工作的特点和规律，突破某些传统观念和旧有模式的束缚，走出一条从宣传改革到节目、体制、管理、经营等全方位改革，符合两个根本性转变要求的道路。

第二，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宝库，包括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略、初级阶段理论、改革和对外开放理论、所有制结构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理论等。从总体上说，邓小平理论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理论。广播电视属于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范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发生变化。新时期广播电视的改革探索，关系到内部和外部方方面面的工作，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的工程，它关系到广播电视的根本性质和任务、舆论导向和功能、发展战略和实现步骤、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因此，邓小平理论作为一种改革发展

的理论，对新时期广播电视的改革发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第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包括广播电视在内的新闻宣传文化工作发表了一系列的指示，继承并丰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特别是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对广播电视工作提出了根本任务和更高要求，这些对广播电视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其次，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时期广播电视改革的行动指南。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时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泽民同志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更好地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更好地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更好地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要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紧密结合我们社会生产力的最新发展和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的实际，紧密结合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的新的发展要求，来深刻思考这个重大问题。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从党建的角度，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提出来的。但分析起来，这也完全符合二十年来广播电视改革发展的实际，同广播电视的内在运行规律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有着紧密的关系。

广播电视作为大众传媒，在实践“三个代表”方面，应该说具有最直接、最突出、最完整的内容。广播电视作为一种运用高新科技武装起来的现代化传播媒介，她始终都与先进的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她的每一步发展变化，都始终